

世俗主义：“祛魅之祛魅”

■段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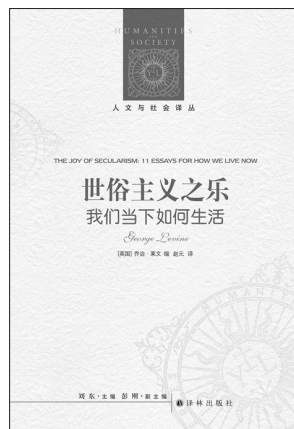
世俗主义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既没有宗教也不承认超自然力量存在的世界上有意义地活着。世俗主义之所以成为当今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议题,自有其历史叙事和思想渊源。任何一个文明都要回答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往何处去?这三大问题后来被简化为一个:人意义何在?在现代西方,西方人认为人生的意义是由外在的神秘存在所赋予的,这些独立于人的存在是意义的居所,不妨以“魅”称之。万物皆魅,从至善到至恶,形成了一条连绵不断的“存在之链”(人只是其中一环),反映着宇宙的秩序。那是一个充满精灵和魔法的世界,直到基督教出现,幢幢魅影被驱散,上帝成为意义的唯一来源,存在之链为之重组,世界遭遇第一次系统的祛魅。宗教改革之后,新教伦理激活了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个人主体渐渐取代上帝,成为意义的输出者,世界被再次祛魅。吊诡的是,走到世界中心的个人主体同时也陷入了虚无的深渊——这厢哈姆雷特王子高唱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那厢麦克白悲叹“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尼采看透了这一切,干脆宣判上帝之死,死因便是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痼疾——虚无主义,表现为主体形而上学所导致的最高价值(至善、上帝或理性)的自我废墟。用通俗的话说,虚无主义就是理性的自杀,而且这种自杀是必然的。当下,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等超级技术已经把人类加速推向存在之链的顶端,但随着“奇点”的

临近,人类自身也面临《黑客帝国》所预言的被技术反噬的危险。而我又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人意义何在?这诚然不是分析哲学式的语言问题,而是关于活着的切实感受,以及由此出发整个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在宗教和超自然力量等虚无主义选项被排除的情况下,如何跳出施魅——祛魅——复魅的怪圈,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活出意义和乐趣?世俗主义尝试给出自己的方案。世俗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一个世俗的世界本身就是有价值的,生命尽管有不可避免的痛苦和损失,它也可以是美好的,有时甚至是快乐的,那种美妙的感觉增加了改善世界的可能性。(《世俗主义之乐:我们当下如何生活》, p1,下同)虽然世俗化的历程从宗教改革就开始了,但始终未脱离宗教信仰。要在一个不信神的世界上发挥宗教曾经发挥的功能,而又不会变成另一种宗教,世俗主义至少面临着两大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如何为原子的个人提供生命的丰足感(fulfillment)。在传统宗教社会,丰足感产生于信仰的高峰体验——顿悟。天主教僧侣作家比德·格里菲思学生时代一次聆听听鸟和鸣的经历,带给他典型的宗教顿悟——“夕阳西下,万籁俱寂,黄昏的面纱笼罩着大地。我此刻想起那时的一种敬畏感。我有跪到地上的冲动,仿佛我正站在一个天使面前;我几乎不敢看天,因为它仿佛只是蒙在上帝脸上的一层面纱。”(p55)这种顿悟虽然不常发生,却能为基督徒提供莫大的现世安慰和投身宗教事业的持久动力。世俗主义也能提供丰足感,不过这种丰足感是不可持续的,缺少“一种渗透随后的行为的力量”。(p58)作者引用了乔伊斯小说《青年艺术家画像》的主人公史蒂芬·代达罗斯的“顿悟”作为世俗版本,与宗教性的顿悟相对照:“他坐在厨房的炉边,因为太幸福了,不敢说出话来。在那时刻之前,他从没体验到生活竟然能如此美好,如此安静。从用别针别在灯上的翠绿色的方灯罩里射出一圈柔和的光彩。在厨房桌上放着一盘香肠和白色的布丁,在柜橱里有鸡蛋。它们是为小学小教堂做完圣餐礼后开早餐准备的。白布丁,鸡蛋,香肠,一杯杯茶。生活毕竟是多么简单而美好!人生在他面前展现了一切的可能。”(p59)虽然史蒂芬的顿悟发生在告解这一宗教行为之后,但他告解的目的和结果不是皈依上帝,而是拥抱世俗。他最终还是脱离宗教走上了自我流放的艺术之路。世俗顿悟的不可持续性可以通过提高其频率来弥补。作者认为,世俗生活并不缺少顿悟般的丰足体验。它们也许发生在你面对崇山峻岭时,或者目睹闪电击中摩天大楼的瞬间,也可能在阅读或烹饪的过程中(p56)。世俗丰足带来的是一种“向上坠落”的崇高感(p255),这种审美体验未必不如宗教性顿悟来的深刻。哲学家杜威就把宗教顿悟纳入到审美体验的范畴:“这种变化无论何时发生,仿佛只是蒙在上帝脸上的一层面纱。”(p55)这种顿悟虽然不常发生,却能为基督徒提供莫大的现世安慰和投身宗教事业的持久动力。世俗主义至少面临着两大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为原子的个人提供生命的丰足感(fulfillment)。在传统宗教社会,丰足感产生于信仰的高峰体验——顿悟。天主教僧侣作家比德·格里菲思学生时代一次聆听听鸟和鸣的经历,带给他典型的宗教顿悟——“夕阳西下,万籁俱寂,黄昏的面纱笼罩着大地。我此刻想起那时的一种敬畏感。我有跪到地上的冲动,仿佛我正站在一个天使面前;我几乎不敢看天,因为它仿佛只是蒙在上帝脸上的一层面纱。”(p55)这种顿悟虽然不常发生,却能为基督徒提供莫大的现世安慰和投身宗教事业的持久动力。世俗主义也能提供丰足感,不过这种丰足感是不可持续的,缺少“一种渗透随后的行为的力量”。(p58)作者引用了乔伊斯小说《青年艺术家画像》的主人公史蒂芬·代达罗斯的“顿悟”作为世俗版本,与宗教性的顿悟相对照:“他坐在厨房的炉边,因为太幸福了,不敢说出话来。在那时刻之前,他从没体验到生活竟然能如此美好,如此安静。从用别针别在灯上的翠绿色的方灯罩里射出一圈柔和的光彩。在厨房桌上放着一盘香肠和白色的布丁,在柜橱里有鸡蛋。它们是为小学小教堂做完圣餐礼后开早餐准备的。白布丁,鸡蛋,香肠,一杯杯茶。生活毕竟是多么简单而美好!人生在他面前展现了一切的可能。”(p59)虽然史蒂芬的顿悟发生在告解这一宗教行为之后,但他告解的目的和结果不是皈依上帝,而是拥抱世俗。他最终还是脱离宗教走上了自我流放的艺术之路。世俗顿悟的不可持续性可以通过提高其频率来弥补。作者认为,世俗生活并不缺少顿悟般的丰足体验。它们也许发生在你面对崇山峻岭时,或者目睹闪电击中摩天大楼的瞬间,也可能在阅读或烹饪的过程中(p56)。世俗丰足带来的是一种“向上坠落”的崇高感(p255),这种审美体验未必不如宗教性顿悟来的深刻。哲学家杜威就把宗教顿悟纳入到审美体验的范畴:“这种变化无论何时发生,仿佛只是蒙在上帝脸上的一层面纱。”(p55)这种顿悟虽然不常发生,却能为基督徒提供莫大的现世安慰和投身宗教事业的持久动力。世俗主义至少面临着两大挑战。

能。”(p60-61)也就是说,不是宗教产生了审美,而是审美产生了宗教。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思想很容易在具有悠久世俗主义传统的中国得到共鸣,比如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之说,就受到杜威的影响。世俗主义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如何为社会成员提供一体同存的归属感。如果说世俗顿悟产生的丰足感属于生活美学范畴,那么世俗主义对于归属感的重建就属于政治哲学范畴了。作者认为,世俗主义应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道德和底线伦理,这是民主的基本条件。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必须是世俗的,惟其如此,它才能最大限度地容纳人类的信仰,并且让民主至少成为可能。(p4)杜威设想的一种超越神话与宗教心理状态的“共同信仰”(a common faith),实际上就是解决归属感问题的世俗人文主义。(p61)世俗主义归属感的核心是伦理道德规范,因为伦理道德本质上是主体间性的。世俗主义对伦理道德的解释有三种倾向。一种是还原论倾向,即在个体有机体层面上对人类意识行为进行神经生理学描述。(p79)还原论的问题在于,对于大脑神经网络运作的单线因果逻辑“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终要么诉诸乔姆斯基式的“先天语法结构”,要么“把意识解释没了”。还有一种是精神分析倾向。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原初的无助”“是有道德动机的源头”(p137),幼年时受伤害而无助的感觉反向引导我们想象一种“要是如何就好了”的生活。精神分析倾向的问题

在于,“原初无助说”很容易被纳入基督教“堕落——拯救”的宗教叙事中,对其更为世俗化的应用应是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假设,当然后者也远非完美。最后一种是进化论倾向。通过梳理达尔文构建自然选择理论的过程,作者发现了当代生物学与达尔文理论在心智与道德问题上的巨大差异。当代生物学是从自然选择的角度理解心智与道德,而达尔文却从心智与道德的角度解释自然选择。也就是说,达尔文在其进化论之上,还设定了一个更崇高的目的论框架。(p226)这是世俗主义所不能接受的。这种考证不禁让人想起福柯在《词与物》中搞的一次翻案:传统观念史认为,拉马克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先驱,而居维叶则是物种演变的坚决反对者。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学却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拉马克的研究属于古典知识型,而居维叶和达尔文的研究同属于现代知识型,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生命是一种历史实体性的存在(现代知识型是承认的)。拉马克与达尔文表面上的相似性,并不能消弭二者在知识型上的根本差异。在世俗主义者看来,达尔文的目的进化论也是一种施魅,然则世俗主义的兴起是否预示着西方文化又一次面临知识型的转换?有必要一提的是,除了书中收入的文章之外,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在《达尔文的危险观念》一书中论证了道德起源于进化过程,社会生物学泰斗爱德华·威尔逊的“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也可作为世俗主义道德起源的理论支撑。



《世俗主义之乐:我们当下如何生活》, [英] 乔治·莱文编, 赵元译, 译林出版社 2019年6月第一版, 58.00元

丰足感使人乐生, 归属感使人安死。果真能解决丰足感和归属感的问题, 世俗主义也就大功告成了。但这该何容易? 宗教只不过是世俗主义看得见的敌人, 西方虚无主义思想传统是隐藏在幕后的终极Boss。尼采曾说:“异教是对自然的肯定, 基督教是对自然的否定。”(《尼采遗稿选》)那么, 世俗主义可以理解为对自然的肯定之否定, 祛魅之祛魅。然则它最终逃出虚无主义了吗? 海德格尔指出:“希腊哲学因对存在的惊异而生。”(《存在与时间》)遗憾的是, 希腊哲学虽然提出了正确的问题, 却给出了错误的解题思路——虚无主义之幽灵就诞生于柏拉图的“洞穴”之中。将世界一分为二的形而上学造成了对存在的“源初遗忘”, 一路导致“客体”对“主体”的技术绑架。然而, 查尔斯·泰勒看到, 科技在制造“座架”(Ge-stell)遮蔽存在的同时, 也让我们有更多、更深刻的理由对宇宙感到惊异。(p72)解铃还须系铃人, 这种更高层次的惊异为世俗主义重启对存在的伟大追问提供了可能。

■著者感言

《汤用彤先生编年事辑》撰著纪要

■赵建永

笔者历 24 载修成《汤用彤先生编年事辑》,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精装本 35 万字)。本书编撰历时既久,其间所涉师友人物和学林往事亦多,有关资料搜集整理颇为不易,其中甘苦唯笔者自知,而成书之时一些师长已作古。先贤风流遗韵化作历史长河的点点滴滴,抚今思昔,能无慨然!故略述编撰心得及历程,敬祈方家教正。

作为“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1893—1964)求学、治学、教学、办学之经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本书从学术史与生活史相交融的新视角,展现汤用彤先生各阶段的风采;自幼深研家学渊源造就的扎实国学功底,青年时留学海外建功中华的雄心抱负,中晚年在西南联大等院校治学治校及其对北京大学学科、学风建设的奠定之功。尤其是他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之家训贯穿一生;为复兴中华和解决文明冲突而不懈探求真知;为维护民族尊严和推动现代化进程而积极参与社会启蒙和改造;为北大复校鞠躬尽瘁,于危难中出任“老北大”的末任校长,领导北大度过新旧更替的过渡时期,成为“新北大”开山校长……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代人文宗师在专业领域里沉潜精进的的身影,及其推进中国文化发展的踏实足迹。

由于汤用彤不喜记述自己的心路历程,前人介绍也都很简略,所以其行迹多已模糊不清。本书挖掘出来的不少史料系首次发表,丰富了汤用彤的形象,也纠正了以往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如他在各地行止年月等。他到南开任教之年,通常说法是 1926 年,而本书结合其手稿与哈佛大学档案等史料,考证他是在 1925 年 8 月上旬抵达南开。

本书力求体现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可读性四者之统一,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为依据,大量使用手稿、档案等未刊材料,并汲取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主要采用客观陈述的方法,辅以必要的考辨和评论,努力做到论从史出。本书认为,汤用彤的全部学术事业系在过渡时代背景下展开,以解决如何实现新旧顺利过渡的时代问题为核心,并推动了这一时代学术发展的新陈代谢,所以其学术人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宗师,汤用彤的一生是 20 世纪中国学

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本书从浩如烟海各类史料里钩沉索隐,详考甄选而成,注意把汤用彤的学思历程放在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中考察。希望有助于学界更好地把握汤用彤的生平和思想,初步解决相关资料分散匮乏的问题,为学人研究他的为人学提供便利。因涉及文献繁多,很多内容限于篇幅和体例而没有收入,拟于以后补入《汤用彤年谱》。

本书编写之初适逢有利时机,汤用彤的一些学生及当事人仍健在,尚可采访求证。但更多细致的资料包括未收入《汤用彤全集》的文稿、除汤一介师家藏之外,还有不少文章、讲义、笔记、书信和相关记录等,已散在各方。其收集整理工作十分困难和漫长,由此我深刻体会到著书不易,整理好史料也非常之难。每理清一个问题,往往如同在写一篇考证文章。若找他某一时期的材料,就要遍查该时段所在地域和所属学科的报纸、期刊、图书、档案等资料,并发掘他与所属精英群体的关系,使其形象在广阔的社会联系中更具立体感。

例如,为研究汤用彤的西学素养和学习经过,我不仅通览其外文手稿,还专程收藏他所有外文书的武汉大学,从哲学学院资料室数万册书中逐一翻阅,鉴定出他的全部外文藏书;为呈现他在某校工作的情况,就耐心遍查该单位的档案和出版物;为寻找他与学衡派的材料而翻遍整套《学衡》杂志;涉及他与某友交往时,则浏览该友的文集、日记和传记;为理清“哈佛三杰”“岁寒三友”的学术互动,就查阅陈寅恪、吴宓、钱穆和蒙文通等人的材料;而汤用彤交往密切的师友和门生,如白璧德、兰曼、欧阳竟无、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胡适、傅斯年、郑天挺、向达、任继愈、冯契、季羨林等人有关史料,皆在搜检之列,这也是本书耗时 24 年才编完的一个原因。

二

对汤用彤道德文章的敬仰,源于我所受家教。1956 年家父读研究生,师从陈旭麓和冯契先生。而冯先生正是汤用彤的得意门生,也是汤一介师最为欣赏的当代哲人。汤师言其走上哲学研究道路的原因之一,就是冯契智慧说的影响。1996 年我负笈北大,入室汤一介,前缘似早已注定。

做汤一介先生的弟子和助手的 18 载,我一直留意搜集有关本书的材料,在整理《汤用彤全集》和撰写系列

汤学论著基础上不断初稿。汤先生审订后,屡催出版,但我对拙稿总是不满意,不断修订完善。如今本书终于问世,惜汤师未及亲见,怅憾何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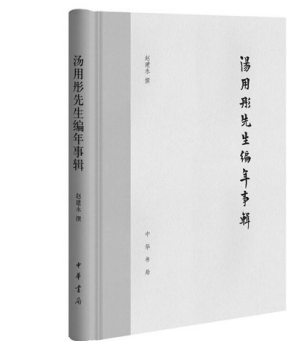
本书是中华书局继黄年、缪钺、严耕望、金景芳之后,推出的又一著名学者的“编年事辑”。《编年事辑》大体属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所言“人的专史”中“年谱”一类。以“编年”或“事辑”命名的年谱,古已有之,但两者合称的开山之作,当为 1936 年历史学家张荫麟所撰《沈括编年事辑》。后以 1981 年出版的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最负盛名,被奉为典范,学界由此而形成现代杰出学人撰“编年事辑”的传统。

作为史书体裁的“编年事辑”,兼具年谱和传记之长。其与“年谱”“学记”的共同特点是,作者多为传主之故旧、哲嗣或学术传人。如,蒋天枢是陈寅恪先生高足,曹旅宁是黄年先生门生,缪元朗是缪钺先生哲孙。正如清华大学刘石教授《“编年事辑”与当代学术史》一文所说:“他们对所记述的对象既有真切的了解,更怀深厚的温情。深厚的温情是其撰写的动力,真切的了解是其著作质量的保障,那么对于今后研究这一时代学术史的人们而言,这类著述的作用之特殊和贡献之巨大,就是不言而喻的了。……职是之故,我希望有更多的‘编年事辑’问世。这类著述之于当代学术史建构的价值不用说了,其中蕴含着尊崇贤贤、发扬师德的古士君子之高尚美行,用今天的人时语来说,也绝对是一种满满的正能量,很值得表而出之。”“编年事辑”丛书的相关评介,可参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诸刊系列文章,于兹不赘。

三

作为纯粹的学人,汤用彤向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的治学,完全不求世俗之声名。高山仰止,心向往之,24 年来对汤著的整理研究已融入我生命中,读书、思考、体悟和写作成为我存在的基本表现形式。为写本书积累的资料虽已盈箱累篋,几近等身,但毕竟廿年未磨成一剑,自愧无地!拙作以“文章千古事,不写一字空”为准则,虽尽发愚诚,仍自属奢望。疏误之处,若蒙方家赐正,无论只字片言,皆吾之师也。

汤一介师对本书撰写倾力相助,即使因病在床仍手不释卷地尽心校阅,在逝世前审订完初稿并作序。全



《汤用彤先生编年事辑》,赵建永著,中华书局 2019 年 1 月第一版, 68.00 元

书从材料到观点,大都经历了汤师的精心指导和严格把关,因此也可视为师生合作。此外,张岱年、季羨林、饶宗英、任继愈、乐黛云、汤一介、张世英、杨祖陶、张岂之、杨辛、罗明缙、黄心川、楼宇烈、许抗生、武维举、杜维明、陈鼓应、余敦康、庞朴、陈来、李中华、乔清举、魏常海、王守常、叶明、赵敦华、王博、郭齐勇、周桂钿、张学智、孙尚扬、雷原、高山杉、余英时、孟繁之诸先生都热心提供材料和各种帮助。在出版审校的五年中,起初李天飞为本书责任编辑,仔细审阅了初稿,在其调离后又由刘明贵接编书,他们共同提出不少中肯的修订意见。对各位师友的大爱付出,我深怀感激,非言语所能尽表。惟有精进不懈,多出优质成果以为报答。

拙著《汤用彤与现代中国学术》(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是我研究汤用彤的总纲,着眼于汤用彤与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关系,而本书则重点在他的生平活动及其思想史要。自入汤门,我协助汤一介师编成了《汤用彤全集(7 卷本)》《汤用彤全集新编(11 卷本)》《汤用彤学记》《会通中西印》《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库:汤用彤卷》《汤一介集》等书,并经汤先生诸师指导写成《汤用彤与 20 世纪宗教学研究》《汤用彤评传》等系列著作,以透视从汤籍、汤用彤到汤一介三代学人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成就、地位与影响。

本书出版既是我汤学研究的总结,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今后拟在尽快把汤用彤、汤一介先生遗稿整理出版的同时,以研究汤先生父子及其师友的百年学术思想递嬗为切入点,延伸到当代哲学文化领域:一是在汤先生父子对汉魏晋南北朝儒、道、释研究的基础上,进而梳理三教关系史。二是对汤先生父子及其师友们的研究,扩展到近现代文化史领域。这类问题在我求学北大之前就很感兴趣,如今在新起点上,衷心祈盼这项工作能为中华文化正本开新,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略尽绵薄之力。这也是学术良心的“无上命令”要求当代学人必须肩负的责任。

《人文》缘起

■张宝明

一部人类文明的历史,总是时刻面临着来自非文明要素的挑战。换言之,一部人类文明史也即是一部企图通过寻求理性或科学能力以应对生活或说支配环境之雄心彰显的历史。说得直白些,就是如何确认不确定性之不确定性之间“我思我在”的命题。就人文的不确定性而言,在当下,她尤其需要作为孪生姊妹并自以为是的科学的理解。本来,没有人文的不确定性为其张目,科学只能以自身的式微结束自己。由此,我们想到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词语:“兼容并包”“崇论宏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这句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话,在今天看来同样适合我们的《人文》。世道人心、人文关怀,皆无迹可寻,实在有失学术之大体。然则考据或实证之价值,却也不全在于校勘辑佚,将锲钉难察视为现代学术之根本。毕竟考据之学,虽始于儒家经籍的训诂,但其目的却在明理,只是世风日下,宏章巨目而不顾,寻其枝叶,较其铁两,在细枝末节处耗尽了无端心神,问其究竟,却答不出所以然。洗弊所及,则是在当今之世,竟也有种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倡导,用功虽深,所学却窄,见树不见林,能人而不能出,毕其心力而渺然一得者,既乏高

瞻远瞩之雄心,又无总览并包之气魄。鉴于此,本刊以人文关怀为中心,治学方法上不求一律,既不菲薄考据,也不悖乎义理,而倡导考据和义理并重,所谓自创新解,必当言之有据而不哗众取宠。汉宋之争久矣,近世以来的中体、西用,科学、人文以及当下的学术、思想之争无不充盈着学术的张力。我们无意于“前朝”的剑影,更无意于“今世”的鼓角。我们于此倡导博古通今的真学问,培育明体达用的新文人。其间所论学术,必遵轨道,重师法,求系统,务专门,不做无根之谈;所发文章,必讲法度,明事理,通文法,求晓畅,切忌言之无物。然则在这熙来攘往的时代,学术为名利所绑,文章为时势而作,良有以也,所以学风和文风的端正实难刻日而求,但是,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文章乃经国之大业,我们既志在于此,就当笃行正道,只求其是,不求其异,发乎其所不得不发,言乎其所不得不言也。

为此,我们更愿意在“比慢”中“坐”而论道。古人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此之谓也。

《《人文》学术集刊由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主办,《人文》编辑部编辑,第一卷 2019 年 9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版推荐

《口述改革历史》(上中下),迟福林主编,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9 年 8 月第一版, 204.00 元

自 2014 年以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启动了“口述改革”访谈项目,旨在对改战线上的老领导、老专家,以及基层实践者进行抢救性访谈,以亲历者身份讲述重大改革事件,真实记录改革历史,客观反映改革历程,保存改革开放的“活历史”“活档案”。这套书分上中下 3 册,9 个改革领域,通过 90 余位改革开放亲历者和见证者的口述访谈,反映改革开放 40 年的珍贵历史。本套书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9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榕荫话》,陈伟军、陈鸣超著,中国书店出版社 2019 年 6 月第一版, 68.00 元

本书收集作者多年撰写的关于书的文章约 80 篇,分为书海行踪、旧书品读、古籍经眼、线装书趣、书里书外、书林趣事六辑。书中文章记述作者地摊淘书、网络“猎书”的奇遇,阅读新书、品味古籍的收获,鉴别古籍版本、贮藏图书的乐趣……配有大量插图,对古籍、旧书、小人书、木板线装书的阅读和收藏等有不少独到见解。

